

# 交往中的文化：

## 第二个千年的世界人口流动史

(上卷)

Cultures in Contact:  
World Migrations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山东大学出版社

[德] 狄克·赫德 著 王昺 刘健 古俊伟 张轲 译

主编  
陈启能

人文前沿书  
人前丛

# 人文前沿书 人前丛

主编 陈启能  
副主编 绝学典  
王孔令贤

“人前丛”由史学出版社出版，个人主编，设计本

## 交往中的文化：

## 第二个千年的世界人口流动史

(上卷)

Cultures in Contact:

World Migrations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山东大学出版社

[德]狄克·赫德(Dirk Hoerder) 著

王晨 刘健 古俊伟 张铭 译

# 本书为“国际工人阶级比较历史丛书”之一

总主编

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

丹尼尔·詹姆斯(Daniel James)

亚历山大·吉萨尔(Alexander Keyssar)

哈佛大学

印第安纳大学

哈佛大学

# 人文前沿丛书

## The Frontiers of Humanities

主 编 陈启能

副主编 王学典 孔令栋 姜 芃

顾 问 (以姓氏的英文字母为序)

Carlos Antonio AGUIRRE ROJAS

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居雷·罗哈斯,墨西哥

Jerry BENTLEY

杰里·本特莱,美国

Peter BURKE

彼得·伯克,英国

Charles BURTON

查尔斯·伯顿,加拿大

Alexander Oganovich CHUBARIAN

亚历山大·奥加诺维奇·丘巴里扬,俄国

Brian L. EVANS

布赖恩·埃文斯,加拿大

Usha GEORGE

乌莎·乔治,加拿大

Carlos GINZBERG

卡洛斯·金兹伯格,意大利

Yvonne HEBERT

伊万尼·赫伯特,加拿大

Dirk HOERDER

狄克·霍德尔, 德国

Georg G. IGGERS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美国

Juergen KOCKA

尤尔根·科卡, 德国

Chris LORENZ

克里斯·洛伦兹, 荷兰

Boris Nikolaevich MIRONOV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 俄国

Lorina Petrovna REPINA

洛里娜·彼得罗芙娜·列宾娜, 俄国

Joern RUESEN

约恩·吕森, 德国

Richard VANN

理查德·范恩, 美国

Immanuel WALLERSTEIN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美国

Q. Edward WANG

王晴佳, 美国

Hayden WHITE

海登·怀特, 美国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 丁守和 | 于沛  | 王 昺 | 朱政惠 | 齐 涛 | 刘家河 |
| 李幼蒸 | 何 平 | 何兆武 | 陈 炎 | 陈 恒 | 陈筠泉 |
| 周春生 | 赵轶峰 | 倪培耕 | 曹特金 | 傅有德 |     |

## 给中文版读者的序言

世界历史常从大西洋地区开始写,从狭义上说,从欧洲开始写。我写此书是从地中海地区开始,该地区在10世纪的时候是横亘三大洲的、多文化、多宗教的地区。丝绸之路把它与中亚和中国连接起来,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拉伯商人把它与印度洋地区连接起来。但是,为什么不从许多亚洲的和印度洋地区的国家开始?因为那里的历史更久远,社会和物质生活更文明,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对普通人来说是这样。我开始写的时候,想这么做,但是想到我的大多数读者都是大西洋地区的人,那样做的话,他们对我的内容会理解不了:从中国人的视点看,俄罗斯在西边,北美在东边。那样的话,学生们都不会明白我的地理坐标。自从本书英文版在2002年面世以来的几年里,我遇到一些场合能够探讨以陆地为中心的中国和中亚的人口流动、跨过东印度洋的人口流动、东南亚岛屿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印度洋沿岸地区的人口流动。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我才能够考虑其他起点。我在中文版中插入了一篇关于7~13世纪中国和中亚地区的人口流动,给本书至少增加了一个侧面。由多纳·加波西亚和马塞尔·冯·德林顿共同组织的、由华盛顿德国历史研究所赞助的一个关于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跨洋人口流动学术会议资助了我所有的海上行程以及先前和随后的陆上行程。加拿大的好几个亚洲移民写的自传让我窥测了他们的艰难人生,他们的人性,他们在两个跨洋地区之间的联系,他们对各种选择、性别和代沟冲突的掂量。从19世纪80年代起,跨越太平洋的流动人口的后代们穿过北美政府官僚树立

的种族主义排外法案的纸墙——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我希望今天的流动人口，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在维护他们做人的尊严方面将面对更少的障碍，尽管每天新闻中仍然会听到骚扰、继续着的排斥和暴力事件。相形之下，普通男人和女人在他们各自的目的地文化融合过程，证明了他们的智慧、能力、网络和对生活蕴藏着深厚情感的选择。在他们所处的具体情况下，他们做出了尽可能广泛的证明。这样的故事也适用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同样也适用于非洲、拉丁美洲和阿拉伯世界。如果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大约5500万欧洲人离开他们的故土，去别的地方寻求更好的生活，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4800万中国华北的人北上东北地区的话，我们应该把今天的流动人口看作“他们自己生活的主人”，看作要在尽可能有利的环境下使用自己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人。生态学家强调可持续发展，流动人口则想要在他们所选择的社会里可持续地生活。

狄克·赫德

2012年12月

# 历史的环境

## ——给英文版读者的序言

人口的流动曾经被定义为国家间的越境行为，现在我们把它理解成一种社会过程，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状态。流动开始于离开父母去独立生活，从距离上说，有可能等于跨越大洲、远涉重洋的迁徙，一个男人或女人一次迁徙都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另一方面，从一个村庄嫁到另一个村庄所需要的适应可能比从一个社会迁徙到另一个大陆的移民聚居区所需要的适应还要多。饥荒和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可能导致死亡，或去附近或远方索食，或沦落到很远的地方。在中世纪和现代初期，商人旅行、军人国外服役、政治流亡和学生流动给后来成了永久移民的人提供了信息。本调查研究中对人口的机动性和流动虽然勾勒出一些明显的差别，但是没有采纳任何限定性定义。

这里选择的综合方法，即把经济区、社会界、政治体、迁徙家庭这几个因素，通过中间诱因和到达目的地之后重新谋划人生道路的障碍联系起来的方法，要求对整个社会和特定男人和女人們的能动性两者进行分析。从个人的观点来看，社会由地区经济和文化以及流动之后的宗教、行业或少数民族网络所组成。我尽力反映了自愿流动人口所感到的他们拥有的选择范围和强制流动人口面临的限制。

这样大篇幅的任何一部作品，如果不是几笔写个总结的话，在逻辑组织方面有较大难度。我选择了时间顺序、题材、空间顺序相结合的视点。为了



便于对世界某个特定地区感兴趣的读者，或对某个特定题材感兴趣的读者自己翻阅，本书每页下的注释可以引导读者找到继续某个地区或话题的讨论的章节。例如，俄罗斯/苏联/独联体人口流动史从欧洲都市化和地区性农业定居（第11章）的一部分开始，分离出独特的系统（第12章），然后变成了几个强制劳工系统之一（第16章），在1989年之后再次开始（第18章第9节）。同样，强制劳工在地中海奴隶流动系统中出现，扩展成亚洲奴工、非洲人质和欧洲契约工，在非洲奴隶制和亚洲“苦力”劳工部分继续有论述，又延伸进20世纪德国、俄国和日本的强制劳工部分。我多次指出不同文化中人口流动过程的相似性，比如像波兰领土对德国经济，墨西哥人民对美国经济提供的廉价劳动力的库。这样的比较只是一种启发性的手段，帮助接触遥远的、“外国的”事情时，能放在熟悉的框架内加以理解。这些比较不能充分反映特定的迁徙和流动之间的差别。

19世纪前国家的常规定义，像“法国”和“英国”，或“印度”和“中国”，给连共同语言都没有的多样化的地区文化强加了一个国家主义的概念。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名词，本研究也不得不依赖这种有缺陷的术语。同样，对社会制度的常规定义也使人误解。比如，农奴制暗示了在主人统治下的定居生活方式。当土壤变得极其贫瘠的时候，儿童需要土地的时候，或流行病夺走大多数邻居生命的时候，沦为农奴的家庭作出何种反应？农奴即使不是他们自己生活的完全的主人，那他们是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对美洲的奴隶和中国的车夫和船夫，也有人问过同一个问题。生活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人口总有一半人通过婚姻变动而改变过居住地。许多人为了寻求机会、为了自己的以及孩子的人生而迁往另一个地方。如果亲友关系的断裂带来的情感成本抵不上预想的物质好处的话，这么做就得不偿失。进行量化分析的人在处理这些多重量表时都会遇到困难，但是每一个流动者都会掂量他（她）的家庭的选择，并算出总数，即决定一生的计划。

在人口流动研究领域，我的一个同事愤怒地简化了他的表格和地图中的数据，因为不这样的话，纷乱的数据就会像一碗意大利面条一样杂乱无章。我们不妨把人类的迁徙比作米袋里的米粒。某种程度上，意大利面和米袋容易研究，但流动人口相反，他们有自己的头脑和未来的计划。成千上万次空

间的迁徙是出于男人和女人构筑自己人生的意志。被迫流动的人的生存取决于自己重新构建自己身份的意志和重新掌控自己的价值观、情感和关系的企图。相形之下,整个历史进程中,统治者和官员,种植园主和资本家,种族理论家和人口计划制定者,都在把人的流动性简化成便于他们制定政策的图表,并把成人和儿童简化为人力资源。与面临武装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的南美土著家庭需要作出的复杂选择相比,或与没有足够土地的中国农民家庭需要作出的复杂选择相比,或与被裹挟进 20 世纪流动劳工洪流的土耳其家庭需要作出的复杂选择相比,他们的上述想法在过去和现在都可谓简单得可怜。在许多国家和政治经济的宏伟计划中,米粒比人类受到更认真的对待。

我自己的文化世界,属于欧洲—北美文化世界,它限定了我的视野。它帮助我超越民族历史,并把许多具体民族群体的多种流动包括进了大西洋人口流动系统。但是作为把世界范围的人口流动、文化交往和冲突综合起来的一种努力,这种大西洋视野有井底之蛙之嫌。我未打算去论述印度语世界的文化含义或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化,我在各章里不断改变术语和观点,目的是脱离以大西洋为中心的视点。我希望这种全球方法将启发进一步的辩论,希望文化背景和我不一样的学者将扩展和修正我的论点。

对多种文化的探讨需要许许多多相反的和相互冲突的视点(参见图 0-1)。哪里是东方,哪里是西方?从欧洲看来,美国属于西方文化;从太平洋对面来看,它又属于东方文化。地图包含模糊的意思,地图学在数百年来都是以欧洲为中心。Harley 和 Woodward 说:“认识到地图在意识形态、宗教和象征方面的含义,特别是联想到出于政治和实用目的对地图进行更传统的评价的时候,大大地强化了一个断言,即地图学完全有资格被看作一种图像语言。”早期的地图叫作“想象的空间的唤起”。但是,一张 20 世纪末出版的 17 世纪印度洋和东亚贸易的西方地图,上面仅仅绘出了欧洲殖民者的航行路线,这张图算不算超出了地图本身的形象,而成了一种权力工具呢?在拉丁基督教的 2000 年开始的时候,科普特基督教徒仍然生活在 1716 年,犹太教世界已经进入到 5760 年。而泰米尔年历标为 2029 年,佛教年历是 2543 年,锡克教则是 301 年。或者说,纪年不应该根据宗教,而是应该根据到达一

片疆土的时间计算？那么，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可能把这一年看作4.2万年。

谁是“他者”？中世纪的“宗教异端”，像20世纪的“逃避服兵役者”（draft-dodgers）一样，所信奉的道德准则、政治信仰和情感世界，与那些有权下定义、影响公众舆论的人不同。一个文化里的出境移民，到目的地之后是入境移民，或许是两种文化中间的漂泊者。“农民卖掉了他的粮食”这样一句无关痛痒的话，可能掩盖了家庭劳动和迁徙的意思。

重新创建全新的术语、编年史和人口流动的概念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尽力在运用中做到谨慎。不同的人类生活方式，不管是小群体（部落），在有限的文化领域内（民族），还是在大的实体里（国家、帝国），或在大洲或跨洲范围内（文明），都是同样有效的文化表现形式。美洲印第安人的撤退和欧美人的扩张都是人口流动，两者通过权力关系联系起来。民族文化是人类历史和社会物质生活中的新近的现象，处在不停的演变和转化之中。“种族”和“肤色”是人为构建的概念，其隐含的意思随时间和文化而不同，白人、有色人的二分法认为白人没有肤色，像“印第安人”或“黑人问题”那样的说法是白人为了掩盖白人种族主义问题而转移视线的策略。称呼的使用也随时间和文化不同而不同。“白人”也叫作“高加索人”（Caucasians），但是高加索地区的人现在不一定被认为是白人。欧洲人和美国的欧洲后裔认为自己是白人，美国人口普查把北非人和亚洲西南部的人定义为白人，然而19世纪末的盎格鲁—撒克逊和北欧种族主义思想则认为东欧人、南欧人、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不是白人。这样人为构建的概念数不胜数，再说，白肤色和其他肤色一样存在很多不同的色度。

在本研究中，我论述的是离家出走的男女大众，或者用另一种强调语气——是披荆斩棘、朝着新方向奋勇向前的男女大众。他们生活在人为构建的肤色和文化概念下，但是他们要根据自己的参照系去评价损失、选择和机遇。我要把重点放在他们的人生、文化表现形式和能动性上面，不仅仅放在流动大众的“溪”、“流”或“潮”上。

# 目 录

## 上 册

### 总 论 变动的世界与交融的文化

#### 第一编 1500 年以前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时期的地中海及亚欧世界

- 第 1 章 先行者:地中海亚洲地区的人口流动及变化…………… (31)
- 第 2 章 连续性:11~16 世纪的流动性和人口流动…………… (72)
- 第 3 章 文明之间交往的结束与宗教驱逐的经济意义…………… (113)
- 第 4 章 奥斯曼社会、欧洲以及殖民交流的开端…………… (132)

#### 第二编 18 世纪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殖民主义

- 第 5 章 非洲与奴隶贸易体系…………… (168)
- 第 6 章 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口岸与殖民地…………… (196)
- 第 7 章 拉丁美洲:人口的衰竭与重新定居…………… (223)
- 第 8 章 毛皮帝国与农业人口定居的殖民地…………… (252)
- 第 9 章 美洲内部和奔向美洲的强制劳工流动…………… (281)
- 第 10 章 人口流动与观念转化:世界观、物质文化、种族等级制度…… (311)

## 总 论

# 变动的世界与交融的文化

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对妇女的研究只是近年才出现的,妇女也留下了历史记录,而不是像沙漠中的道路一样被湮没无痕。但是,历史学却并未过多地关注人口流动,虽然人口的移动、男女性别的作用不断地改变着社会,各种因素的作用也在不断改变。这里,我叙述和探讨的首要目标是从地方性的到洲际的乃至全球性的人口流动。其次,我将讨论人口流动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具有侵略性的武装人口流动摧毁了现有社会。农民与劳动者迁徙的目的是成为主流社会的一员。在迁徙途中以及在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必须为生存而奋斗,并建立新社会。他们会享受爱情,生儿育女,尽快将他们自身的文化习俗与新的环境相融合,并建立崭新的经济基础。最后,我将关注流动人口在进入新社会后进行的自我调整。他们并没有破坏既定的文化。事实上,稳定社会也面临着人口流失的问题,有些人离开去寻找更富挑战性的机会,获得更有保障的生活。

### 1. 流动的人们:10 个世纪的变迁

我们的研究将从地中海向外扩展,探索其与东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关系。我们也将以同样的视角关注中国或波斯湾—印度洋世界。在欧洲,包括西哥特人、条顿人、斯拉夫人在内的人口迁徙运动在 11 世纪就已经全部结束,这些流动人口永久地定居下来,性别关系可能在这个时期有所改变。<sup>①</sup> 而在中亚和非洲,迁徙运动持续了许多个世纪。在讨论 16 世纪欧洲殖民者开始与所有大洋沿岸地区居民进行的贸易活动之前,我们将简要回顾其他文明地区历史上的迁徙运动。殖民者在自已与他人之间建立了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的界限,却掩

---

<sup>①</sup> David Herlihy 研究了 10 世纪以来欧洲性别关系的变化,重新审视了男女之间的权力和财产关系。《Medieval Households》(Cambridge, Mass., 1985), 79-111.

盖了因殖民而出现的人口融合现象，最终造成人种的变化。有人认为构成种族对立的因素之一是文化等级以及固有的种族优越感，其中的差别是文化的差别。

对于这部分血缘关系复杂的人群，19世纪欧洲中心论的卫道士们强行将之归入与他们民族文化相似的民族国家——但是在这之中，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仍然存在，与日本人所鼓吹的他们民族的英勇行为相似。在几个世纪时间里，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三大洲的流动人口在从黎凡特到南海的广阔区域内相互影响。印度洋或美洲的尚不知名的各种文化相互影响，并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着改变。地中海、中国和印度的商人在全球范围内沿海岸线建立了各种融合的社会。奴隶是被迫流动的人口，农民则是自觉流动的人口。他们普遍与当地居民通婚或联姻。从遗传学的角度看，“纯粹的”或文化独立的民族只是一个神话，而历史久远的文化延续性也仅是民族认同暂时的自我建构行为。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民族多元性与文化多样性特点在历史上已经真正经历过社会实践。

人口流动、文化的相互作用以及变迁已经是人类生活、社会结构、商贸交换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对自我和他人的认识曾经往往是（并仍然是）自我的。拉丁人基督徒破坏拜占庭基督教世界并消灭反对者的理由，据说是中亚和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可能威胁基督教统治的欧洲。单从等级关系来说，17世纪伊斯兰奥斯曼人统治时，多个民族与宗教共同存在，与此同时，神圣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势力通过宗教劝诫和强权摧毁了中北部欧洲的1/3的人口。当前，第三世界的难民在工业化社会泛滥的同时，第一世界的资本也向全球的各个角落渗透，深刻影响着当地居民。外来者、他人身份的确定有赖于权力关系、当代的卫道士和历史学家的反思。

我们将剖析五个人口流动频繁的时代及其文化变迁。首先是拥有丰富文明的地中海和黑海世界，生活着信仰基督教的拉丁人和拜占庭人、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以及各个犹太人团体，地域囊括西亚、南欧和北非。跨越撒哈拉沙漠商路的行商将东地中海与黑非洲联系起来。13世纪末，被蒙古人中断的跨越亚洲的商路在蒙古和平时期重新恢复。地中海世界的核心从多元文化的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新月地带转移到拉丁人基督教控制的意大利城市。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欧洲在15世纪以前仍然是偏远地带，尽管商人们已经穿越北部山脉到达过尼德兰城市布鲁日的市集。但是，北方无休无止的封建战争阻断了意大利城市的商人乘船向西到达伊比利亚的商路。14世纪，以巴尔干为中心的汉萨同盟建立了独立的北方“共同市场”，但它在一个世纪内失去了向北海荷兰扩展的机会。1500年后，贸易和商业中心向大西洋沿岸、伊比利亚和荷兰转移。在东地中海地区，正在兴起的奥斯曼帝国改变了穆斯林国家的形势，改变了土耳其人

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热那亚商人与伊斯兰阿拉伯商人建立了贸易关系,并通过他们与印度建立起贸易关系。贸易范围超越了国境,商业联系和生产者的流动将各个文明连接起来,但也带来了权力冲突与斗争。

地中海地区的奴隶贸易体系将来自中亚、北非和黑非洲的男女奴隶带到南部欧洲,并将欧洲人带到北非。基督徒的十字军东侵运动制造了大量流动人口,但始终没有带来统一。拉丁人、拜占庭人、科普特人、聂斯托利人以及其他各门各派与各种各样的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和东亚的佛教徒互相影响。定居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法兰克人皈依阿拉伯伊斯兰教,诺曼人沿大西洋海岸及西里岛定居,农民流动人口在中欧地区建立了散落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居住区。世界各地的城市和城镇都需要流动人口维持基本的人口基数。14世纪的气候变化与瘟疫导致亚欧大陆1/3的人口死亡,社会发展基本停滞,人口数量的恢复及经济的复苏就消耗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战争、统治者家族间与其国家机器、与僵化教条的宗教卫道士间的争斗阻碍了流动人口的迁徙。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签署后,新的国家体制和人口流动才得以继续发展。

15世纪时,“欧洲”成为一个概念,拉丁人的基督教已经确认了排他的目标,特别是针对犹太人。伊斯兰世界已经被奥斯曼家族统一,其疆域北起巴尔干半岛和黑海,以安那托利亚地区为中心,南抵北非和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理性的官僚体系与传统的帝国和宗教特权发生冲突。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1570~1650年的“困难时期”造成大量人口流失。<sup>①</sup>这个时期,在民族和宗教范畴内,排他性观念将世界人口归化为几个大的类别,比如匈奴人、突厥人、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从认知的角度看,这个过程把杂乱无章的人口集团用一个简化的认知方法组织起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这个过程划分了界限,保证了集体的团结。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这个过程完全孤立了外来人口。

肇始于15世纪中期的第二个人口迁徙运动把来自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商人和士兵带到其他发达的文明社会中。西非成为阿拉伯—地中海贸易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自身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体系也得以发展。美洲文明的特点是劳动力人口流动和因战争造成人口流失。在印度洋世界,来自商业中心的商人从东非流动到暹罗,从古吉拉特的城市流动到南部中国。欧洲人开始参与到迁徙运动中,虽然开始时只是零星的人口流动,却造成了巨大灾难,他们给美洲带来病菌和毁灭,通过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给非洲造成浩劫,在亚洲沿海地区建立了小块殖

① William H. McNeill, *Europe's Steppe Frontier, 1500-1800* (Chicago, 1964), 56-59.



民地。在亚洲或非洲的人口流动和定居行动必然导致通婚、联姻和强奸行为。混合了各种文化背景的婴儿出生了，新的人群出现了。与欧洲人接触后，和平的人口迁徙运动和军事征服行动造成人群的重组；现代人创造并重新创造了他们自己：阿根廷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土著人，开普殖民地的荷兰人—非洲人—英格兰人—印度人，马来西亚半岛的土著人—中国人—其他人。但是在欧洲，伊比利亚国家却驱逐了重新在北非和阿姆斯特丹一线建立贸易关系的犹太人和摩里斯克人（小摩尔人）。封建秩序阻碍了商业和重体力行业的发展。

对于人口流动的跨文明的比较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管理者与唯利是图者、传教士与朝圣者、商人们、农民和劳动者、游民与边缘人群在全球范围内迁移，或被派遣到遥远的地方，或远离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环境。在统治者或宗教领袖建立的各个宫廷、要塞、寺院中以及教堂里，都有迁移而来的工匠或艺术家安居。迁徙而来的劳动者在中国和安第斯山脉修建了道路和桥梁。泰姬陵的建筑师、沙特尔大教堂的建筑师以及特诺奇蒂特兰人需要来自其他地区的高级工匠从事建筑工作，需要妇女来服侍他们。除去文化意义，妇女控制着纺织品制造业和制衣业，而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则是迁徙而来的单身妇女。流动人口中的武士群体深入其他地区，他们定居、杀戮、融合，并适应新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这类人口流动汲汲营营于寻找机遇；所有人，包括后来创造了典型社会模式的北美西部的定居者，都参与到驱逐原住民的行动中。边缘地区社会的特点是缺少政治组织，缺少有实力的都城和严格的阶级结构以及社会统治。进入当地社会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多。相关经济集团的每个变化都会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sup>①</sup>

在全球范围内，人口流动对每一个社会都是独特的现象，表现在经济活动、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以及迁移权力、性别等级和儿童地位等各个领域内。各社会之间通过投资策略和剥削维持联系。来自核心地区的资金提供了原动力。这些新面孔通过贸易和转运给大庄园带来了大批的奴隶或签署临时契约的劳动力。劳动者仰仗肥沃的土地、矿产资源或气候环境获得财富。殖民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劳动所得又回馈到核心区的宗主手中。这导致边缘地区的男女劳动者更加贫困，流动更加频繁，从而改变了大城市的劳动力需求状况。

来自欧洲的流动人口向两个方向流动：多数来自农民阶层，他们在气候温和的地方建立农业殖民点；少数有财力、有权力的流动人口或他们的代理人则向热带地区流动。他们自私地认为，无论是加勒比地区还是亚洲的土著居民，都会为

① Robert Bartlett and Angus Mackay, eds., *Medieval Frontier Societies* (Oxford, 1989).



他们这些外来的欧洲人工作。但他们的幻想化为了泡影,欧洲的下层人士当然也不能很轻易地长途跋涉来这些地区工作。气候温和地区的居民选择预付急于还债的劳动者旅费的方式,热带地区的大庄园主们则依赖于用暴力掠夺终身性的奴隶从事劳动。宗教信仰和肤色差别成为等级划分和剥削的标准。

在第三个时期,大西洋核心区的工业化和生产集中化需要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工匠与熟练工人携家带口迁徙而来。在不列颠、美国(美洲)、欧洲的俄国或德国,通过铁路运输和铁壳汽船航运,想象中的机会真正地、轻易地实现了。那些赤贫的人,即使最低廉的跨海航行费用也无法负担,就只能待在家里,或在本地或邻近地区步行迁移。商业国家里的劳动者阶级在自由国家的新工业经济秩序下成为多余的人,成为国际流动无产者。但是,在19世纪末,俄罗斯—西伯利亚体系仍然保持着其特殊性。

在亚洲殖民体系中,中国华侨商人与外国人殖民地建立了联系,当地居民或被迫迁移到遥远的大庄园,或被束缚在当地以生产用于出口的农作物。非洲黑奴向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流动被第二次迁徙浪潮代替,他们是来自亚洲的契约劳动者,但他们的劳动往往是奴役性的。与欧洲农奴相似,非洲黑奴和亚洲苦力在日复一日地反抗与文化再创造过程中,在约束体制中,争取哪怕很少一点自我生存的空间。契约性的亚洲劳动者可以有机会选择回家,也可以再次签约或组建独立的移民社会。在东南非的纳塔尔等地,多样的、有组织的印度人团体的数量,与北美城市中同等规模的外来人口数量一样众多。

19世纪,某些国家各自独立的殖民体系统一在帝国主义秩序之下。迅速增长的欧洲人口向世界范围内扩散定居,欧洲资产阶级与他们的北美后裔一起严格控制着全球资源。无论投资何时获得收益,招募各种族与性别的劳动者都经过精打细算。各阶级间以及核心区与殖民地间的权力关系决定了谁被迁移到哪里,或谁有可能依自己的意愿流动。高回报的投资与低收入的劳动成正比。有色人种与白人相比,所获得的收入较低,劳动受到更严格限制,性别、等级与阶级差异也是如此。对于自愿迁移的工人而言,国际劳动市场给他们提供了机会。比如说,易北河东部的农民选择在柏林与芝加哥之间的地区工作,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选择在锡兰、其他亚洲地区和东非地区工作。但是他们的迁移路线很特殊,是一个依靠他们在国外的同村的乡亲、同事或亲属建立的交流网络。太平洋人口流动体系开始补充大西洋体系,直到北美国家排斥亚洲人口时速度才放缓。这个过程在欧美地区持续到1914~1918年,在亚洲则一直持续到1937年。

第四个时期为20世纪的前半叶,其特点是:欧洲出现大批难民,亚洲人口流动加速,大西洋人口流动体系发展停滞(但开始转向中北美地区)。在资产阶级